

——你想了解
接受美学、阐释学、结构主义、符号学、
心理分析、风格学、语义学
诗学、西方马克思主义、价值论、交流学
……等等现代文艺学派的优劣短长吗？

台声出版社

〔苏〕 A · R · 齐 斯
M · J · 斯塔费茨卡娅 著

西方艺术理论中的方法论探索



西方艺术理论中的方法论探索

[苏] A·Я·齐 斯 著
M·П·斯塔费茨卡娅

董学文 周清波 译
张 武 陈松岩

台声出版社

А. Я. ЗИСЬ
М. П. СТАФЕЧКАЯ

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КАНИЯ
В ЗАПАДНОМ
ИСКУССТВОЗНАНИИ

Москва « Искусство » • 1984

根据莫斯科 艺术出版社1984年俄文版译出

西方艺术理论中的方法论探索

台声出版社出版发行

承德地区印刷厂印刷

767×1092毫米 1/32印张6.25 字数130千

1989年5月北京第1版 1989年5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62-039-5 / I·141 定价：2.50元

译者前言

西方美学和文艺学新方法论的引进，在我国掀起一股不大的浪潮。这股浪潮，对改变我国以往美学、文艺学研究方法的单一和状态的封闭，对吸收新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果，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个作用的实际价值，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显著。今天，我们几乎随处都可以看见由于新方法论的传播而在文艺学、美学研究领域结下的果实；对比地翻一翻五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以来的美学和文艺理论著述和杂志，令人仿佛感到恍如隔世。

历史毕竟是大大前进了。无数事实证明，学习和借鉴西方美学和艺术理论中的新方法论，对我们是有益的。因为没有这一“尊新知”的学习，我们就难以弥补几个世纪来在这个方面的缺欠和不足，也难以谈得上在新的条件下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文艺学。

但事情也有另一面。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即在接受和传播当代西方美学、艺术学方法论的过程中，我们明显地存在着某些“消化不良”的现象：人家用近一个世纪走完的路程，我们“呼哧呼哧”地仅用二、三年的时间就跑完了；人

家分阶段一个时期一个时期、一个浪潮一个浪潮掀起的方法论革新运动，我们却不分先后、三口两口一古脑儿狼吞虎咽地填满了肚子；人家还在分歧、争议、探讨甚至渐渐排斥的某些方法，我们的有些“文化倒爷”（此处借用“倒爷”一词，并无讽刺意味——笔者）便饥不择食地拿来“兜售”一着儿；人家方法论中的长处、短处和特点，还没有咀嚼出多少滋味，这里就生吞活剥盲目地运用起来……这不是揭短。这是开放、变革、引进、趋新阶段正常的现象、难免的状况。但唯其如此，我们才感到在这个时候有必要进口一点有利“促进消化”的“良药”——深入细致地分析、鉴别、评介和探索西方美学、文艺学方法论的学术著作，不管这类著作本身的意见是否都十分正确、可取，但对推进西方美学、艺术学方法论引进的健康发展，对提高和深化我们对这些方法论的接受水平和认知能力，无疑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我们翻译的这本书——《西方艺术理论中的方法论探索》——就是这方面的一部研究著作。

西方美学、艺术理论的引进已经走完了它的最初的萌动期，现在到了自觉地对它们加以“评头品足”的时候了。这一工作做得好，我们的感性经验和片断思考就会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我们追求真理的蹒跚脚步就会变得更加坚定和稳定些。但愿这部书的内容会给读者带来这样的效果。

该书的第一作者A.Я.齐斯(1910年生)是苏联颇有影响的资深的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他曾担任苏联文化部全苏艺术学研究所美学研究室主任，长期从事美学和艺术理论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并曾获得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功勋科学家的称

号。他的著作甚丰，除这本书外，我国学者已翻译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基础》一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出版），此外，还有《审美范畴的历史》、《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讲义》（两册）、《艺术和美学》及《美学中的对抗》等著作。

应该说，苏联理论界对西方美学和艺术理论中的方法论态度经历了一个“之”字。他们曾一度把“现代方法”同传统方法尖锐地对立起来，认为它违背了马列主义原则。后来，他们开始纠正这一偏向，认识到“现代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艺术学方法论并不是处处矛盾的，它们之间有着互补的作用。近年来，苏联美学和艺术理论界对当代西方美学、艺术批评和艺术理论一般方法论现状的分析越来越多。这部1984年的著作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和氛围下产生的。

这部书，我们认为至少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作者按着历史的过程，比较清晰地梳理了西方美学和艺术理论中方法论发展和演进的思想轨迹和逻辑线索。

“战后初期，西方美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是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学说。60年代它们开始受到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理论的排挤。近年来，符号学和结构主义又开始让位于解释学和接受美学。”当然，并不能由此认为，某一时期的西方美学界只提出一种观点。“在所有这些年中，多元论和折衷主义一直是西方方法论状况的突出特征。然而，在多元论方法论之中仍可分出在每一时期最为盛行的主导流派来”。作者认为，“从一种观点到另一种观点的转变看似偶然，其实却表现着一定的规律，这一规律归根结蒂是由社会生活的运动，如艺

术思想的发展（后者更加直接）决定的。”作者继而分析了这种转变的根源。

二、该书对西方美学和艺术理论方法论中诸种观点的探讨，富有辩证的态度。如对以西德著名预测专家、艺术理论家康拉德·普法夫为代表的艺术社会学观点，既肯定其承认只有在历史的坐标系中才能确立艺术与思想和符号系统间相互作用的真正逻辑这一历史主义出发点的合理性，又指出其仅限于考察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狭义范围里抽象地划分出来的几个社会阶段、不联系各种社会因素、不触及生活根本问题的历史主观主义局限性。又如，作者认为，“在接受美学中，在作品与接受者相互作用的性质和艺术发挥功能的方式等方面所做的正确观察与相对主义的方法掺混在一起。”该书在认真介绍西方文化界对现代派艺术各种批判性看法的同时，还理智地提出了“在分析现代派艺术及其审美观点的过程中，重要的是把现代派艺术家和理论家的理论主张同以对现代派艺术的美学分析和哲学分析为根据的评论性观点区分开来”的见解。这些都有助于我们克服对复杂的方法论现象裁性思维的毛病。

三、该书作者独具只眼地观察到，西方美学和艺术理论方法论的衍变中，似乎意识到“蒸发”净思想、“输掉”世界观以及丧失对本时代人的吸引力的危险，因而悄悄地在方法论中增大了人文的因素和社会内容的成分。这从一个侧面又进一步证明了传统“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的生命力和有效性。方法论的更新，不能总在阐释的主观性和更为客观精确地分析艺术现象的企图中飘忽不定。作者指出，“西方文学理论和艺术理论转向解释学是与对解释的内容方面、对文学

和艺术的文化意义问题以及对艺术思想归宿研究兴趣的恢复相伴随的。”“接受美学研究也同样具有这一倾向性，后者以恢复作品的文化历史及社会背景为其主要任务”。作者通过一系列考察，最后认为，“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中出现的这种在广阔的世界观背景上分析艺术作品的倾向，可以看作是文学研究争取理论‘解放’的一个征兆，是在克服经验主义、放弃对仅靠完善分析程序和尺规构成就可解决如何把握艺术内涵这一问题的幻想方面的一种进步。”这一卓见，使我们对进行一场新的全面的理论和方法论综合运动抱有信心。

四、该书相当熟练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出发，对各种西方美学和艺术理论中的方法论观念进行学术性批判分析，力图使人们从中辨别真伪、分清良莠，这对我们也颇有参考启迪意义。作者认为，西方美学和艺术理论方法论个别情况下所表现出的明显的研究潜力，“毫无疑问，这些正确方面是建立在其观点的马克思主义成分的基础之上的。”诚然，作者的分析评论中，不乏冷峻、严厉的一面，而且仍残存着某些陈旧的、僵硬的批评格式，但就总体而言，该书还是尽量做到实事求是的。尤其是作者反复抓住西方美学、艺术理论方法论中的主观主义、反历史主义的绝对化以及缺少广义上的社会历史分析弱点，则相当准确和系统。作者颇为机智地运用了一种批评艺术：当一个西方艺术思想家批判另一个西方艺术思想家的时候，从中获得好处和胜利的是科学的唯物辩证法的美学观与文艺观。作者实际上在提倡和呼吁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一元多样”的方法论格局。与此同时，该书对同一种方法论的不同阐释者的观点，也进行

了颇为细致的对比性剖析。例如，同是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姚斯和伊瑟尔的异同在书中就花了相当多的笔墨，而著名民主德国接受美学家瑞曼的观点也一并作了对照性介绍；又如，同是社会学方法，法斯、普法夫、阿多尔诺、马尔库塞、戈德曼等人的意见就极不相同。这样做，体现了作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精神。

五、该书虽是学术性专著，但涉及的问题相当多。实证主义、阐释学、接受美学、结构主义、心理分析、现象学、符号学、具体社会学、形式主义、神话礼仪学派、经验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史方法论、风格学、语义学、诗学、词汇学、价值论、交流学……几乎凡是西方出现过的美学、艺术学方法论及代表性人物和理论家，都在这里碰到了。作者给了读者一个西方美学、艺术学中方法论状况的全景轮廓，很便于读者对它进行宏观把握。

当然，这本书只是苏联众多美学和文艺理论家中在这一探索领域的一种看法。目前，苏联理论界和学术界对西方美学、艺术学中方法论的认识仍在发生移动和变化。我们不能“一叶蔽目”、“以管窥天”。就是对该书的有些观点，我们也要进行分析。

我们企望，倘这本书能在我国美学和艺术理论界对当代西方美学、艺术学方法论的探索和反思中起一点“引玉之砖”的作用，那译者的心愿也就满足了。

董学文

1988年11月15日

于北京大学蔚秀园

目 录

- 译者前言 董学文
代 序 (1)

第一章 艺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

- 1 资产阶级美学中的主观主义社会学观点 (22)
2 现代派与艺术和美学的命运 (35)

第二章 艺术交际和作为其最终环节的接受

- 1 艺术交际的社会制约性 (63)
2 艺术交际的接受环节 (73)
3 接受美学艺术观 (76)

第三章 艺术作为文化现象的解释

- 1 艺术创作的文化意义和思想潜能 (101)
2 艺术的文化功能 (109)
3 解释学与艺术作品的文化地位 (122)

第四章 艺术语义学和艺术含义的解释

- | | |
|---------------|--------|
| 1 风格与含义 | (137) |
| 2 语言与含义 | (147) |
| 3 含义与价值 | (152) |
| 4 价值与评价 | (164) |

注 释

代序

60年代，西德哲学家H.-G·伽达默尔的著作《真理与方法》(1960)问世之后，解释学观点在资产阶级的美学、艺术理论和文学理论中就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取代此前颇有影响的实证主义方法论体系。但这决不是说当代西方的美学、艺术理论和文学理论已经摆脱了实证主义方法。当然不会是这样，尽管有充分理由认为70年代在这些学科的方法论探索中占据中心位置的恰恰是解释学和接受美学。解释学和接受美学的问题不仅吸引了各个流派的资产阶级哲学家，而且使人文知识其它领域的专家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但是，决定学者们转向解释学和接受美学这一现实的，不仅仅是它们在当代资产阶级美学和艺术理论之方法论探索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也有意识形态实践方面的原因，两种社会制度间思想对抗的复杂环境等等。而在现阶段，各种意识形态问题已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其作用正在日益增长^①。解释学和接受美学的研究历来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这在今天表现得尤为突出。

对于西方的人文意识来说，解释学一向代表着从思想内容的角度看待研究客体和注重解析的完整性。从这一点来看，脱离对资产阶级文化来说极为典型的实证主义思潮而转向解释学这一倾向，可以认为是实证主义危机的一种表现。但是，由于以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方法研究文学和艺术长期

以来在资产阶级美学中一直占有主导地位，因而造成了这样一种气氛：既热衷于解释学传统，又试图使对艺术现象的分析形式化。所以，资产阶级文学理论和艺术理论采用解释学方法是为了建立一个解析规则和解析模式的体系，这决不是偶然的。然而，不能把某些资产阶级解释学观点的人文高调与“模式化采用”解释学、把其实质归结为容易表述的方法论原理和手段这一企图混为一谈。这类原理和手段与解释学的研究原则根本不是一回事。

对当代资产阶级艺术理论之各个倾向的批判性分析，当然不能局限于解释学观点这一狭小圈子。这里需要对整个方法论状况作更为广泛的分析，这样才能在历史的运动中推定解释学思想的发展逻辑。

在过去，尤其是在19世纪，解释学曾以人文意识的建立基础自居，并企图扮演人文科学理论出发点的角色。而现代解释学——如上所述，它一方面被当成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对立面，另一方面又受实证主义的直接影响——它首先是要掌握结构主义以及心理分析和现象学的思想，以便把它们运用于对艺术作品的解释。

要理解当代资产阶级艺术理论和文学理论在什么程度上遵循解释学解析的传统，它们在什么程度上以揭示精神财富和理想为目标，换言之，即它们想在多大程度上保留研究艺术和文学之科学的人文基调，就必须弄清解释学观点的代表人物向解释这一概念中注入了怎样的意义，其目的和文化功能是什么。这也就是要回答“解释学能对解决上述问题作出什么贡献、它将在方法论上把当代美学思想引向何方”这样一个问题。

近几十年来西方文学理论和艺术理论的研究范围，可以比作一个独特的炼丹室，学者们在其中不断寻找研究艺术品的最新原则。每一“新生”方法的出现都伴随着希望的浪潮，给人一种也许终于找到了准确分析尺规的希望。文学理论家和艺术理论家们相继把现象学的和社会学的、价值论的和接受美学的、符号学的和解释学的方法及其它研究方法放到其分析判断的天平上衡量，试图证实它们在方法论上的适用性。在此应该指出，多数西方美学家和艺术理论家都是站在多元论的立场上，坚持用以片面向归纳对艺术进行分析的某一方面为基础而完全忽视其它方面的观点取代艺术创作的完整理论。此外，他们制订出来的每一套方法都不无包罗万象之奢求。比如，主张符号学方法的人把其对艺术的分析局限于研究艺术的语言结构，与此同时却宣称这样的研究能够全部穷尽艺术科学的一切任务^②。现象学家则与此相反，认为艺术理论（艺术哲学）的真正使命不在于分析符号构成，而在于研究艺术欣赏借以实现的意识的层次和活动^③。至于“社会批判”流派的代表人物，则主张揭示艺术的意识形态结构，在他们看来，正是意识形态结构决定着艺术欣赏^④。美学、文学理论和艺术理论也和其它形式的人文知识一样，仿佛“输掉”了世界观和理论探索方面对本时代的吸引力。研究视角常常相互交叉的批评家和艺术理论家们为完善其科学尺规和概念组成，如上文所述，都试图建立新的解析方法（符号学的、现象学的、社会学的等等）。与此同时，每一新方法的代表人物都竭尽全力地排斥“传统方法”——因此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界的种种争论都带有明显的双歧性质：“现象学”反对“价值论”，“价值论”反对

“符号学”·等等^⑤，以此类推。但是产生了一个问题：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从这些“炼丹骗术”中吸取的那些方法论思想究竟有多大价值？

西方艺术领域里的理论研究实践雄辩地证明了：当代艺术理论中各种方法论体系的缤纷杂乱，乃是整个资产阶级审美意识陷入危机的一种表现。

在对大多数文学理论和艺术理论流派来说 谊称典型的“尺规”意识的狭小范围内勾勒出当代资产阶级美学中方法论分歧的清晰画面，这是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尽管概括和评价某一方法论流派的理论文献相当丰富。无论资产阶级人文知识的代表人物们玩弄什么伎俩，问题仍然是一个：他们的方法论观点能否解决当代文学理论和艺术理论发展的各个重大问题？这些观点能否为分析艺术提供一套符合当今科学发展水平的可靠尺规？通常，资产阶级艺术理论家的文学批评著作和理论著作都是综述概观性的，而不具有分析性和观念创新性。这些著述中很少讨论涉及文艺研究的重大方法论问题。

例如法国理论家、语言学家G·穆南的著述，他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对当代资产阶级艺术理论的发展水平具有代表性。在他看来，在研究文学的科学中，两个时期——“抒情分析”时期和科学的、尺规的分析时期呈周期性相互交替。^⑥自然，这种见解是穆南进行了一定的经验性观察的结果，但其中是否含有对当代资产阶级文学理论之方法论状况的批判性思考呢？这种尚未失去一定实证内容的“例证”方法，只能暴露出这位醉心于经验性观察、把掌握和吸收实际材料作为唯一目的的当代法国学者的理论思想是多么模糊和飘忽。

不定。穆南的例子有力地说明了当代资产阶级文学理论恰似在两个极端——解释的主观主义和更为客观地分析艺术现象的企图——之间摇摆不定这一事实。然而无论走向哪个极端，都要偷换分析对象，走上歧途。

遵循所谓“材料美学”（换言之，即以确定研究者对待研究材料的立场为目的的美学）的原则，常常要同回转到解释学观念上相结合。但是解释学所历来固有的包罗万象的目标又要求走出只注重材料、实物、经验性形式的狭窄理论界线而步入精神传统的空间。正是把重点转移到作品的内在意义及其解释上在解释学中一向占有中心地位，虽然这一点在术语上有过各种各样的表述。以实证主义观念为出发点的经验主义艺术理论和文学理论分析的不是作品的思想-审美意义，不是其艺术内容，而是孤立的文本，是某种实物结构。实证主义思潮在艺术理论中的统治致使在批评理论中“尺规论（或译工具论）”观点也占了上风。

然而“尺规论”目前已越来越多地暴露出了自己的荒诞无稽。这一点西方学者们自己也直接或间接地肯定了。特别是当操作过程中一切经验潜力实际上都已枯竭、研究者碰上了任何文化艺术现象所内在具有的所谓“象征性剩余”（文化意义）时，“尺规论”方法的不适用性就尤其突出。因此，“尺规论”和哲学判断的结合就日益牢固地进入了当代西方艺术理论和文学理论的实践中。值得注意的是，就连托多洛夫这样一位如此著名的法国结构主义者也对这一过程颇为关注。在分析法国艺术批评思想的现状时，他指出在今天占主导地位的乃是浪漫主义的思维结构，而在他看来这正是学者们转而采用存在主义方法来研究文学和艺术的结果。诸

如文本与作者的不一致、文本的真实性等在结构主义文艺研究中占有中心地位的问题，托多洛夫把它们同个人本身的真实性的“真实性”问题联系起来。^⑦

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中出现的这种在广阔的世界观背景上分析艺术作品的倾向，可以看作是文学研究争取理论“解放”的一个征兆，是在克服经验主义、放弃对仅靠完善分析程序和尺规构成就可解决如何把握艺术内涵这一问题的幻想方面的一种进步。将尺规方面的诸问题与个性问题的哲学-文化学方面结合起来，这说明资产阶级文学理论和艺术理论已明显感觉到了对自我确定、自我意识作为两种形式的社会文化过程的需求。

在解释学在当代西方艺术理论思想中的作用增长的同时，接受美学在方法论探索中的使用也十分活跃。在研究艺术品解析的诸问题时，接受美学强调必须考虑到艺术作品欣赏，即所谓接受的多种类型。艺术作品欣赏的多样性被看成是一种正常的、自然的情形，而艺术涵义本身则被认为是艺术文本与接受者相互作用的结果。

综上所述，西方的解释学和接受美学总体上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意识的范围，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资产阶级意识的危机在当代的发展。因此，对它们进行分析和概括是异常重要、十分迫切的，而且不仅仅是为了弄清当代资产阶级美学的现状。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对解释学和接受美学在方法论方面的潜力进行批判的分析，还有助于我们从这些观点中分清良莠。

列宁曾经指出，资产阶级思想的各个流派原则上讲是错误的、虚假的，但其中也可能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有趣的观